

社会科学的新哲学

[美] 詹姆斯·博曼 著

丛书主编 苏国勋
杜小真

李霞 肖瑛 等译
苏国勋 王建光 等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科学的新哲学/(美)博曼(Bohman,J.)著;李霞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社会理论译丛)

书名原文:New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ISBN 7-208-05761-3

I. 社... II. ①博...②李... III.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IV. C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77698号

责任编辑 屠玮涓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社会理论译丛 ·

社会科学的新哲学

[美]詹姆斯·博曼 著

李霞 等译 苏国勋 等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5 字数 269,000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5761-3/C·209

定价 22.00元

丛 书 前 言

“社会理论译丛”是一套旨在向读者译介国外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理论进展的系列丛书。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领域重要著述的译译,能丰厚我们的理论积累,从纵深上不断开拓我们的思想视野,增强我们的社会想象力和理论反思能力,以利于各门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

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实质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故,当代许多社会思想家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 A. 吉登斯等人,从不把自己的研究称作“社会哲学”或“社会学理论”,而是冠名为“社会理论”,其意在于强调,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不可脱离对构成人类行为之背景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依赖和制约,换言之,社会结构和文化既为人的行动提供了资源和手段,也是它的条件和限制,二者同样不可须臾或缺。而在我们现行的科学知识体系中,由于历史和现时诸种因素的制约,无论社会哲学抑或社会学理论都是相对发展缓慢,迄今仍属薄弱的环节。这与处在转型中的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生活节奏大幅加快、社会结构急速变迁的形势很不谐调。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社会理论要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和较大的变化,才能适应 21 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经济—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国际环境,解决由此带来的种种冲击和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社会哲学研究局限在历史唯物主义狭窄的概念框架内,这里且不论这种沿袭斯大林式的做法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一分为三——作为它的自然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在社会领域中的外推和应用即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思维领域中的应用亦即辩证逻辑——在学理上的正当性或合理性问题,仅从实践后果上,这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归结为孤零零的几条原理,成为学生们死记硬背用于应试时的干巴巴教条的做法,就与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与当时社会生活的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完全相背离,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再来看看社会学。众所周知,社会学自70年代末从中国大地上破土复出后,迄今已走过20年的历程。当我们回首这一过程时,可以欣慰地看到,社会学在学科知识普及、专门人才的培养、分支学科的涌现、应用研究的广泛开展以及调查统计分析技术和能力的提升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是50年代以前所无法相比的。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每个时代都会有其各不相同的任务要解决,不可同日而语。全面地看,社会学在取得可喜成绩的背后确乎也隐藏着某些令人忧心的危机。事实上,社会学从获准恢复研究之日起,就带有它定位上的某种残缺。例如“社会调查的学科化”、“剩余科学”等观点,尽管出于社会学在我国发展中的曲折经历而在复出伊始刻意凸显其经验研究性格,意欲摆脱哲学干预的苦衷是不难理解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显而易见的残缺在日后的发展中一直没能得到根本的弥补。结果就造成应用研究大多未脱离社会调查统计的层次,理论研究却亦步亦趋地甘当这种应用研究的尾巴和附庸。究其根本,最为致命的问题是在社会理论上抱残守缺。社会学如果缺乏了社会理论的想

象和反思,必然沦为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的肯定,不仅就像一个先天不足后天缺乏营养的孩子,难以在现代知识分工体系中立定自己的脚跟,而且势必会失却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托克维尔到哈贝马斯、卢曼直至布迪厄和福柯等一代代社会思想大师们所烹调出来的社会学味道。一门学科如果丧失了自己在认识事物和解释事物方面的学科意识,那么无异于自己取消自己存在的理据。

近年来,由于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也由于实地调查报告式的社会学研究面临的升级困境,忽视社会理论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是,如果取而代之的是人人竞相谈论时髦明星那样把社会理论大师挂在嘴边,或者置于文章注释中作为点缀,那也不过是学术泡沫现象的泛起,恰恰从另一侧面表现出社会想象力的枯竭,与真正的学术建设和品质提升了无干系。

要克服社会学表面繁荣和背后危机四伏的症状,不仅需要首先在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层面下大功夫,而且要在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社会理论上做扎扎实实的基础建设工作,希望这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能为这一建基性工作增添些许砖瓦,作出绵薄的贡献。

苏国勋

前 言

几十年来,哲学家和方法论学者一直在努力把复杂多样的、被称作“社会科学”的活动统一起来,但是这种努力并不成功。在一个极端,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家要求社会科学必须模仿自然科学。但是社会科学从来没有使用预测性的一般规律(它是自然主义知识的主要特点)的方式来成功地模仿自然科学,因此人们经常不承认社会科学具有“科学”的尊崇地位。从与之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人文科学”的拥护者把解释和意义置于社会科学的中心;他们的方法用来服务于更高的道德目标。有幸的是,这些并不是惟一存在的观点。在一个迄今为止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努力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特征结合在一起,努力把自然科学的说明与人文科学的解释的相互混合视作社会科学的特点。马克斯·韦伯及更晚近的尤尔根·哈贝马斯和一些人一样,极力主张这种不可化约的方法论的复杂性。本书试图以综合的方式来发展后一种传统,这是因为“新的”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已经为它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和概念,还因为“新的”、更复杂的说明形式已经出现于社会理论中。社会科学旧逻辑寻找统一性之处,正是新逻辑发现复杂性之所在;社会科学旧逻辑寻找理想化的重构之处,正是新逻辑由以开始社会科学的真实实践之所在。

本书主要的观点是:社会现象充满着非决定性和结局的开放性(open-endedness);在一些有生命力的研究纲领中,好的说

明必须找到好的方法,去处理非决定性所提出的问题。在科学哲学中,后经验主义削弱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人都同意存在着被称作科学知识和科学说明的确定性事物。与“公认的观点”及其对科学的理想化的构想相反,后经验主义告诫我们去关注各门科学的历史和实践;因此,本书使用的所有例子都来源于真实的社会科学。事实上,历史的转向和实践的转向已经把社会科学置于当代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中心。所有科学(包括社会实践本身从中由以形成概念的那些社会科学)现在都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历史的实践、社会的实践和自我反思的实践。但是从这个假设出发,许多后经验主义者和科学社会学家得出一个未经证明的结论:“新”科学哲学不再是规范的(normative)。本书的一个目标是:质疑支持这个观点的后经验主义解释,并提供一个转向社会实践的不同看法。

当然,“新”科学哲学不可能通过简单地指出一些理想化的、据称是普遍的知识特征来为它所思考的实践制定规则。毋宁说,它起始于如下假设:没有通向科学知识的荣耀之路。但是从一个不同的方面看,这个“新”科学哲学必定仍然是规范的:它必须发展出一些供自我反思的批判标准,以便用来比较各种各样的说明策略和模式;它必须深入阐明新社会理论的目标和意图,并判断新社会理论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和意图;并且,它必须在非决定性中找到能帮助研究纲领评估它们成功说明的适当标准。质言之,它必须有助于改变我们的科学观念,即从一种个体认知者面对一个中性的事实世界转变到知识被视为一个持续进行着的社会和历史的成果。近年来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并正在对这种科学观念的转变发生影响。

我的主要目标是从一个后经验主义角度出发(包括因果性、规则、解释、整体论和社会批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处理社会科

学哲学主要问题的方式。此项努力也是在推进规范的社会实践认识论中的一个个案研究，一个只有通过与社会科学合作才能完成的计划。我认为，许多后经验主义哲学家之所以从这种参与实践中得出怀疑主义的结论，是因为他们错误地使用了社会科学的范畴和结果。通过对社会科学更加严密的检验，揭示出已经运作于社会科学中的适当性标准和评价标准，这些错误的怀疑论的推论是可以得到矫正的。这种反怀疑主义的结论得以确立的最佳途径属于社会科学中的这样一些研究纲领——理性选择理论、常人方法学和沟通行动理论，它们把可认知的社会行动者当作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我的大多数例证将选自上述这些研究纲领，虽然我在从头至尾论述与解释科学社会学和民族志的一章中讨论了近来的“后现代”民族志。为了与后经验主义社会科学的自我反思特征保持一致，一些争论在这里将被视为与科学本身的社会特征有关；实际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两者本身都是一些最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纲领的主题。为了验证我的观点，我将把本书所讨论的每一问题都与各门社会科学本身的实际争论相联系。因此，它们将成为验证我哲学观点和论证的“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研究将包括当今的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中一些理论、经验和方法论的争论。

除了这种规范的但又是后经验主义的观点之外，本书的结论并不反映任何一种理论传统的承诺。如果它的中心问题是提出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比较的一些具有广泛理解力的标准，那么一个规范的说明叙述必须认识到，即使对于相同的现象也存在着多种合法说明的可能性。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特定的理论纲领已经努力尝试把许多不同类型的说明类型和理论整合为一个前后一致的的综合的整体。除了韦伯之外，或许最好的综合理论的例证是法兰克福学派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主张的、至今仍存

在于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作中的“科际唯物主义”(interdisciplinary materialism)纲领。无论我是否可能接受他们在科学方面的任何实质性理论或观点,我都把科际唯物主义纲领看作是社会科学哲学的正确方向。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在尝试把各种形式的经验性社会研究整合进他们的综合性的说明理论时,两者都是有启发意义的;因此,他们必须要解决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观点和说明观点之间进行判断的问题,以便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之间作出调停。

如果没有许多机构和个人所给予的帮助,这种工作将是不可能的。我要感谢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它提供的研究经费使本书的写作得以完成。我还要感谢圣路易斯大学既给我提供了专门的暑期研究资金,同时又减轻了我的教学工作,使我能有时间完成这本书。由国家人文学科基金资助的一个冠名为“解释与人文科学”的暑期研究机构,帮助我澄清了许多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我感谢它的指导者伯特·德雷弗斯(Bert Dreyfus)和戴维·霍伊(David Hoy),以及参与他们生动活泼讨论的所有人。还有很多人也给予了我帮助,这里无法一一提及。我要特别感谢尤尔根·哈贝马斯和托马斯·麦卡锡(Thomas McCarthy)所给予的批评和建议。我还要感谢迈克尔·巴伯(Michael Barber)阅读了几次初稿,威廉·查伦(William Charron)在理性选择理论部分给予了协助,感谢保罗·罗什(Paul Roth)在解释部分给予了批评和比尔·卡斯帕里(Bill Caspary)阅读了初稿的几个部分。他们都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最重要的是,我想感谢格雷奇恩·阿诺德(Gretchen Arnold)在支持、情谊、批评、编辑上的建议以及其他每一件事情。我把这本书献给她。

导言：后经验主义、 非决定性与社会科学

在社会学中，我们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关于假设的清晰明白的趋向。

——奥托·纽拉特*：《社会科学的基础》

当这些哲学家以及他们的原则各自达到他们的鼎盛，而他们的原则又被发现不足以产生事物的本性时，我们再一次有必要探究下一种原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上面引文代表着对一个特定类型学科之复杂性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在第一句引文中，纽拉特正期待着在社会学中将

* Neurath, 纽拉特, 奥地利社会学家和哲学家, 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在后文我们还要看到纽拉特之舟(Neurath's boat), 这是他用于反对维也纳学派的另一成员卡尔纳普认识论而发明的一个隐喻。卡尔纳普认为有一些基本句子可以直接陈述感觉经验, 它们是不能纠正的, 所有其他可靠的复杂陈述都是由这些基本句子结构而成。在批评这一观点时, 纽拉特把我们的知识比作一只船。他说: “我们像水手一样, 不得不在大海上重造我们的船, 从未能将它卸下并用最好的元件来重建它。”因此, 知识是以历史为条件的, 并且在任意时期, 只要其足够多的声称是可接受的, 它就得到坚持。然而, 知识的任一部分都可以被替代, 以保持整个知识体系的运行。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知识的基础。这一隐喻后来为奎因所采用, 被作为反基础论的有力比喻。——译者注

出现一个统一化的趋势,以便结束社会学的不成熟性并使之踏上安全的积累性成长之路。在第二句引文中,亚里士多德把他那个时代的自然哲学的发展描述为非连续性的;他的告诫并不是去寻求统一性,而是使回答任何一个“为什么”问题的说明性术语——“原因”——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当然,纽拉特是维也纳学派的一个成员和一名实证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将不同的科学加以统一,并且至少在这句引文中实际上是一名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后经验主义者。在本书中,我将遵从第二个而非第一个策略,论证对社会科学史和说明性实践的自我反思,将取代方法论方面的立法和统一。

在社会科学史的早期,社会科学对于哲学家来说,并不像对纽拉特那样在认识论上是困惑费解的。在早期现代性中,当社会改革者和工程师们希望社会科学能够解决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时,极少有人会怀疑他们所生产的知识的性质。社会科学能简单地仿效当时一些获得了成功的科学:霍布斯曾把古典力学看作是社会科学提供了恰当的“抽象”方法,而涂尔干却偏爱生物学的整体论特征。但是后来表明,科学中方法统一性的假设,使得人们对社会科学抱有希望的同时,也对它备感失望。一方面,改革者寄希望于技术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批评者认为这种知识使人们变成被专家控制的对象,并赞同一种把人(*beings*)视为自我诠释的、自主的主体的社会科学类型。这个关于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目的的争论,引发了19世纪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即自然科学(*Natur-*)和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本质区别的争论。这种不同类型科学之间的区别所引发出来的其他一些区别,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哲学部分传统的研究主题,例如:研究方法方面的说明与理解之间的区别;研究领域方面的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区别,

或者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研究目的方面的技术控制与增长的理解之间的区别。甚至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概念的反对者们，也认为这些区别对于他们拒绝作为人文科学模型加以接受的那种科学的部分来说也是正确的。总之，争论的双方都极力在方法上作出炫耀，一方是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进路，而另一方是诠释学的途径，每一方都确信自己的方法具有鲜明的特色，因而在为人的研究而生产正确知识的过程中应被赋予特权地位。

尽管这场哲学争论一直延续于科学机构中自然主义盛行的全部时间里，但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早期出现了新的生机，因为一些不同的原因，^[1]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强有力的、本质主义的区分开始受到损坏。也许令人奇怪的是，损坏的推动力首先来自于自然科学方面，即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例如托马斯·库恩、玛丽·海塞和保罗·费耶阿本德，^[2]对自然主义“公认的观点”发出的挑战。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反差的一长串标准全部来源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科学知识观，即观察的中立性和经验的给定性；单义语言的理想性和数据对理论解释的独立性；对知识前提条件的普遍性和理论选择的标准性的信念。在库恩以后，支持这些看法的许多观点和区分一下子瓦解了。由于拒斥实证主义及其“方法统一性”的命题，许多为在不同科学之间作出泾渭分明区分而辩护的历史理由也灰飞烟灭了。关于人文科学方法论特征的更新看法，例如泰勒和德雷弗斯的观点，已经更多的是与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相关，而不是与认识论问题和科学问题有关了。^[3]不论这些努力对我们理解政治和道德有多大帮助，但是它们对社会科学进行后经验主义理解并没有太大的贡献，对澄清自然科学的道德目的和政治目的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在许多方面，后经验主义已经消除了社会科学有争议的和

边缘的地位,并把它们直接置于一些新的认识论争论的中心。作为这样一个争论,科学的“旧逻辑”在对所有充分说明进行演绎-推理法则的(deductive-nomological)重构中就是例证。根据这种重构,认为它能够表明,为什么社会科学中的一些说明,例如功能主义失败了,而其他一些例证,其中包括使用效用最大化“法则”的“理性说明”,为什么成功了(在下面第一章将会讨论)。后经验主义为了取代这种高度理想化和非历史的重构,而转向各门科学的真正实践和历史。这种历史的进路导致了一种看待科学知识的反本质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否认有任何单一普遍和必要的一组特征有资格把一个实践规定是科学的,或把一个说明规定为适当的。这种历史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把后经验主义导向科学实践的在地性和情境特征。这种特征通常是社会学的,这个观点可见于第一本重要的后经验主义著作——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

在这本书中,库恩用“范式”来描述科学的历史,在一个“范式”中长期起解决问题作用的是“常规科学”,它被理论变化的革命时期所中断。与亨普尔主张的单一说明或经验主义对具有特权地位之说明的诉求相反,后经验主义把理论和学科放在一个它们自己也置身其中变化和发展的、更大的社会和历史脉络中。伊姆雷·拉卡托斯把这些比较大的单位称为“研究纲领”,并根据它们是否能“富有成效地”解决问题或“蜕化”为对核心假设的特别辩护,来实用地判断它们成功与否。这种蜕化的和富有成效的研究纲领之间的对比,标示着后经验主义试图在相互竞争着的理论和不同样式的科学实践之间作出决定时,重新引入规范而理性的标准的一次最初努力。可是,科学过去是否以这种方式发展,这并不完全清楚,这对自库恩以来的科学哲学中一直盛行的“合理性和相对性”增添了一些质疑。^[4]

在这些争论中，出现了两个与历史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有关的问题。首先，与比较大的像理论和范式一样的单位相比，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问题正好指涉我们对科学实践的描述应该是在地性的和脉络性的；如果这些描述过于在地化，那么任何比较和评估都将是是不可能的。转向实践是否能够使规范的认识论判断完全成为在地性的？第二，反本质主义进一步减小了对理性重构的规范组成部分进行再思考的可能性。缺少确定的一系列说明或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特征，是否就不可能使之在较好的说明和较差的说明之间作出区分？所以，后经验主义尚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不倒退为一个非历史的和本质主义的认识论情况下，得出对相互竞争的说明和研究纲领进行比较和评估的标准？

在“旧”科学哲学中，这些问题涉及科学的客观性观点，并以可靠地诉诸演绎推理和经验检验的方法论标准得到解决。在后经验主义假设下，客观性现在涉及一个研究纲领的选择以及对它的评估标准的选择，这只有诉诸较弱的理论证明和理论评价形式才能得以解决。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赞同一个程序或者接受一个规范能被论证所支持或者所削弱；至少它能被理性地评估……这正是批判理论思维的任务。”〔5〕

本书中的分析力求去完成由现存的不同研究纲领产生的理论之说明力的理性评估形式这一任务。这些研究纲领包括理性选择、常人方法学、诠释性的社会科学和沟通行动理论。我之所以选择这些特定的理论，是因为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及其说明范围一直继续存在着；它们自身也可以进行理论间的比较，并共同分享关于能认知的社会行动者以及确定他们产生和维持社会生活的能力的最小假设。尽管关于什么是理由和什么是信念，以及理由和信念如何起到说明的作用，这些理论的看法极为不同，

但是它们都共同开始于行动问题,并把行动者有意向性的观点作为好的社会科学说明的一个必要成分。

本书开始于“旧”的说明逻辑所构想的行动理论问题。我试图对亨普尔和帕森斯确定的理性的社会行动的一般和必要特征提出批评。然后,我将努力重构在特定研究纲领中的典型的说明形式,并在社会理论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即规则和规范的说明重要性上,对这些说明形式进行比较。虽然亨普尔和帕森斯在发现所有社会行动的普遍特征和规律上并未取得成功,但是还是有可能对一个特定的研究纲领进行更具历史取向的理性重构;这样做就使评估在这一研究纲领中的说明的结构和范围成为可能。我将这个重构的结果称为一个说明模式:一系列陈述是在一个特定研究纲领中进行适当说明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能被当作一个标准或规范来使用:缺少一个或多个这样的陈述或前提的说明是不完备的,因而也是不适当的。每一个说明类型和模式,最好不仅通过检验每个纲领的主要理论家的著作来发现,而且还要看取自于其研究实践的好的说明的范式性案例。我并不把这些模式看成是精确的逻辑推论,而更多是把它们看成库恩式的范例:这些范例是“范式性的”案例,因为它们展示出一个特定类型的适当而完备说明的一般特征(第二章)。^[6]类似的模式能被重构为功能主义的和宏观结构的说明(第四章),和批判的社会科学的说明(第五章),尽管这些后面类型的说明范例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研究纲领。作为范例,这些模式以纲领“内核”的形式代表着成功案例的精华,尔后并能延伸到包括其他种类的案例上去,只要这些个案具有相类似的特征。^[7]这个延伸外推的过程同样也表现出了研究纲领的限制,例如在一贯地使用理性选择理论的内核情况下使行为最大化;虽然许多活动令人惊奇地非常符合这个模式,但是许多更为明

显的理性行动事例，例如选举投票，就完全不符合这个模式。这些重构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它们提供了一个既非普遍的又非在地性的反思形式。根据本书所提出的关于说明的观点，只要有这样一个可重构的模式，那么就能建立起说明的适当性标准。然而这个中程重构的方法仍然是后经验主义的，因为它把社会科学哲学的作用看成是对科学实践的反思，故而它是自我变化的、自我反思的和规范的。^[8]

任何科学实践的一个自我反思方面是用相互竞争的理论对同一个现象作出不同的说明。在社会科学中，这个特点尤其突出，因为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理论取向（更经常应归于样式而非其他）。如果我们接受后经验主义观点，即不存在恒定不变的说明特征和理论特征，那么我们如何能对这些说明和理论作出判断？如果理论甚至在社会科学的目标方面都无法取得共识，那么判断又如何可能？在由证据证实或证伪的宽泛意义上，这里所讨论的理论确实认为社会科学应该是经验性的。但是在缺乏中性描述的情况下，建立数据和说明数据就经常是同时并进难以分开的；正像唐纳德·戴维森指出的，这是意向性的说明。^[9]与其说缺少标准，毋宁说这种循环论证表现出一个存在着太多标准的困境，因为这些标准中没有一个是确定的或限定的。鉴于这种证据上的诸多问题，后现代怀疑论者索性放弃了对支撑在地性的、非决定性现象进行有成效的、元理论化（metatheorizing）^[10]的哪怕是弱标准的寻求。

我的论点是，即使我认为我们对能解决问题的一般“科学”无法谈论很多，但是这个怀疑还是无法成立。理论仍然能根据它们经常所公开宣称和其他理论共有的许多目的一起被加以判断。我在第五章中论证，任何说明模式都能用于社会批判的目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说明模式都特别适合社会批判目的，并且